



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资金扶持项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二卷

李 怡 主编

幻想文化与 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

任冬梅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资金扶持项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二卷

李 怡 主编

幻想文化与 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

任冬梅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2卷, 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 / 李怡主编; 任冬梅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543-0263-7

I. ①现… II. ①李… ②任…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4738号

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

Huanxiang Wenhua yu Xiandai Zhongguo de Wenxue Xingxiang

策划编辑 张灵舒

责任编辑 黄初镇 张灵舒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杨亚丽

责任校对 张 瑛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 510665)

网址: www.ycwb-press.com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版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0.75 字数200千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263-7 / I · 25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总序：回到“大文学”本身 |

李 怡

“回到文学本身”，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倡议。20世纪80年代，有感于中国文学受制于社会政治这些“文学之外”的现实，我们提出“回到文学本身”，注重“文学之内”的研究，强调“审美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代中国人觉悟到谈论文学不再等同于政治表态，也有别于道德教育，对“文学作品”思想与文字的鉴赏从此成为一件意趣盎然的事情，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复苏的基础，也是如《名作欣赏》这样的“欣赏类”、“阅读类”杂志闪亮登场的历史背景。阅读、欣赏，一个似乎意味着文学普及的名字，在80年代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大众普及”，而成为广大文学研究学者自我训练的起点，在当时，数量众多的活跃一时的文学研究者都与《名作欣赏》等结缘，或者贡献自己的新锐见地，或者长篇连载，甚至在此发表处女之作。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形势”陡变。一方面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都逾越了“文学”的边界，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思想史的领域里一展身手，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日益跨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其他学科特别是现代政治学、思想史、社会学的一种材料。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文化研究”的范式更在中国流行开来。“文化研究”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其先驱人物是威廉姆斯（R. Williams）与霍加特（R. Hoggart）。霍加特在1964年创办的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第一个正式成立的“文化研究”机构，从80年代开始，“文化研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及美国等地迅速发展，至今，它几乎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进一步打破了文学与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间隔，将文学作为社会文化关系版图中的有机元素，其重点不在品味文学的审美个性，而是掂量和解剖其中的“文化意义”，特别是热衷挖掘社会结构中种种的阶级、权力、性别与民族的关系。可以看到

的现实是，“文化研究热”已经以汹涌澎湃之势在中国高校与学术机构中蔓延开来，每年我们都可以读到这样的学位论文：在文学的学科标志下尽力展开的却是关于社会文化与历史问题的广泛讨论，文学现象不过只是其中的部分材料而已。

西方的解构主义也以“文学性扩张”的判断给予这样的思路莫大的鼓励。乔纳森·卡勒告诉我们：“如今理论研究的一系列不同门类，如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历史等，皆可以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文学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雅克·拉康的研究显示了诸如在精神活动中意义逻辑的结构作用，而意义逻辑通常最直接地表现在诗的领域。雅克·德里达展示了隐喻在哲学语言中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描述了古代神话和图腾活动中从具体到整体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类似文学题材中的对立游戏（雄与雌，地与天，栗色与金色，太阳与月亮等）。似乎任何文学手段、任何文学结构，都可以出现在其他语言之中。”^①

文学内容的日渐稀少的确令我们对“文学”的曾经的痴迷遭逢尴尬，越来越多的“文学之外”的知识领域的入侵让我们对自己的学科归属不无焦虑，甚至“绝望”：

没有人对诸如文学叙述、描写和修辞，以及审美经验这类东西感兴趣。失去了这些探讨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什么理由再撑着文学这张招牌呢？

传统的文学学科，更不用说现当代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回文学的困境不是来自外部其他强势学科的挤压，而是自己要改弦更张。就像一位黄花闺女，不是受到外部强迫，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跃跃欲试要出台——这有什么办法？

写下这些文字，并不是要对别人说三道四，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在内的文学同仁们的警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在潮流之外，没有人能够被幸免，也没有人能够被赦免。正像当年杀死上帝一样，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杀死文学的刽子手，如现在不放下屠刀的话。^②

^① 乔纳森·卡勒：《文学性》，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0—41页。

^② 陈晓明：《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思考》，《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就是我自己，也因为文学史叙述一再为抽象的理论所占据而充满困惑：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我曾经试图提出：“我们当今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结构’，严重忽略了对文学作品（也就是文学“原典”）的把握和理解新的文学史写作必须认真解决如何让文学史的教学与学习回到文学作品这一根本，如何通过文学史的讲述呈现文学自身的魅力、如何让文学史的学习成为进入现当代精神殿堂的趣味无穷的过程等问题。”^①

当然，所谓学科的“规范”其实并不可能获得完全的共识，我们也无法断定跨越性的研究在未来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的学科，形成新的学术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我们跨出了文学，试图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领域里寻求伸展的时候，也同时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我们怎样将“文学”作为材料，最终都必须在其他学科中取得真正的发现，换句话说，以“文学”为跳板，我们最后要达到的“高度”必须符合其他学科的水准。比如我们可以借用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主题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状况，但那时的中国是不是就如我们这些文学材料中所描述的那样呢，“文学”自己就不足够了，能够检验我们结论的一定是历史学的相关“规范”，我们也可以通过延安文学的发展探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但是进入社会史、经济史与政治史的领域，可供我们比照分析的主要不是文学的想象，而是一系列丰富的数据与案例，在这个时候，我们既有的知识显然已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近几年来，在突破文学边界，进入“文学之外”的道路上大步前行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尴尬，例如新左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希望将延安一十七年一“文革”的文学历程肯定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文化硕果，殊不知，不仅其他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人难以认同，就是近现代史学界与中共党史的学者也颇不以为然。

跳出“文学”的框架，在更大的范围内表述问题，看起来是超逸了文学，其实骨子里却依然动用着文学的想象，所以就无法真正回答“文学之外”的问题。这样的尴尬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那么，回到文学自身，是不是就真的可行？真的理所当然，真的理直气壮呢？

如前所述，虽然我们目睹了这一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的激动人心的“拨

^① 李怡：《文学史是什么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5期。

乱反正”之功，也见识了跳出“文学”之后的种种尴尬和困惑，但是，平心而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如何更文学”其实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在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诉求既美丽，更正义，因为我们曾经的文化专制让一切关于文学的讨论都无可选择地纳入了政治表态的范畴，在这时，重申“文学”的价值，其理由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恢复人基本的言论权利与自由思维的权利。正是在这样一种“正义”的向度上，我坚持高度肯定这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并且主张继续研究和光大这一伦理正义的可能，对于90年代就此的诸多批评都不予认同。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在当时，对于伦理正义的强烈渴求的确远远超过了对于口号内涵与学理的细致分析，比如什么是“文学”？什么又是真正的“文学本身”？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当时，在未经严格的学术追问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将这一“文学本身”视作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赋予它某种本质性的猜想，比如思想的现代性，语言的白话，等等。

正是这样未经追问的模糊给了90年代的质疑以机会。当然，这不是说在今天，所有自“文学”逃逸的学人都出自同样的思想基础，但至少其中相当多的人们是逐渐感受到了“文学”的不稳定、不可靠，从而企图在“文学之外”的领域捕捉某种真切的事实。比如，我们曾经说，追求“现代”的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涵，但问题在于，深入的考察却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思想却千差万别，胡适有胡适的现代观，陈独秀有陈独秀的现代观，一向质疑的鲁迅更与他们迥然有异，更不要说左翼、右翼与延安道路了；白话呢？虽然可以解释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但是后来的考证也逐渐证明，新文学并不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现实，何况新文学作家本人也有放下白话，重操文言的选择。如此一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究竟是指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类似的困惑吸引我们的研究者开始迈出（或者说“解构”）了“文学”的大门，企图在一个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层面上寻觅现代中国人的切实追求，而“文学”逐渐降低为社会文化整体面貌的组成元素之一。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说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是指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张扬，文学的审美特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

本走向。就20世纪文学而言，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生长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合理的评价。^①

在今天，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多历史事实的逐步澄清，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现代中国作家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等待他们关怀和解决的“问题”绝不只是作为“艺术”的文学，在更多的时候，文学的问题、艺术的问题是不得不纳入更大的也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的整体问题框架中来加以思考的，而且问题本身的错综复杂与历史的流变繁复也使得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单纯，介入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在这个时候，抽象、笼统地谈论“回到文学本身”显然也是空虚的，无的放矢的。

既不便抽象地诉求“回到文学本身”，又不能因为超逸“文学”而陷落到四不像的尴尬，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努力的方向呢？在我看来，一个可供思考的方向就是：继续回到文学，但不是那种理想化的“纯文学”，而是包含了诸多社会文化信息的“大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未来，也许就在“回到大文学本身”。

回到大文学本身，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把对“文学”的关注融入对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既然文学本来就不能独善其身，那么就不妨最充分地尊重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将文学的阐释之旅融通于寻找历史真相之旅，这里有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真相，经济生态的真相，也有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刻烙印，与历史对话，将赋予文学以深度，与政治对话，将赋予文学以热度，与经济对话，将赋予文学以坚韧的现实生存品格。

回到大文学本身，最终体现“本身”的还是“作品”，也就是说，所有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对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离弃文学作品，直接讨论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与经济；恰恰相反，进入“文学之外”，是为了最终返回“文学之内”，这里的“内”不是抽象的本质化的事物，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说，对所有历史文化的考察、分析并不是要确立我们新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是深化和完善文学作品的“阐释学”。

^①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回到大文学本身，我们的理性认知与感性想象、知识社会学的考辨与感悟体验式的批评也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术发展，曾经以对理性规范的强化来排除文学的感性想象，以知识论的建构质疑体验论的缺陷，其实，即便是在“文学之外”的最抽象的理性思辨之中，我们也难以摆脱骨子里的文学想象，反倒是不能自我承认的这种“想象”干扰了本该“不必想象”的社会科学的认知。与其让想象与感性如此扭曲地存在，不如为他们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结构”。如果我们力主回到以作品阐释为旨归的“大文学”，那么保留和发挥我们的感性想象也就是“文学”的题中之意；与此同时，跨出“文学”的“小”，纳入“文学之外”的“大”，也让其他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有了一席之地，让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社会科学认知模式有机会进入文学研究，弥补我们既往学术的种种不足。

| 序二：中国梦的诞生、破灭和重现 |

刘慈欣^①

不久前看到了一本奇书，由日本学者武田雅哉编撰的《飞翔吧，大清帝国》，首先书名就感觉不对，大清帝国与飞翔有什么关系？这是一本图册，翻开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清朝。在那些晚清的书籍和杂志上的图画中，我们看到了飞行器、潜水艇、各种神奇的现代化大机器和由电光驱动的未来城市。同时我们还知道，在晚清的幻想文学中，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作家们用文学描述了想象中的未来中国，那个中国拥有基于先进科技的强盛国力，有着昌明的政治和灿烂的文化，为全世界所仰望。晚清在我们的心目中一度是腐朽和没落的代名词，但现在我们惊讶地发现，那原来竟也是一个多梦时节。工业革命后强盛进步的西方与古老的清帝国相接触，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催生了这些绚丽的中国梦。晚清鲜为人知的这一面让人浮想联翩，这是古老的中华文化一次短暂的返老还童。

随之而来的是梦想的破灭，千年的皇朝轰然倒塌后，共和国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中的东西，中华大地陷入军阀割据的战乱中。中国梦像绚丽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美梦切换成噩梦，在民国的幻想文学中，想象中的未来中国变得黑暗和怪异。

任冬梅博士的《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就是从学术上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幻想文学中的国家形象进行回顾和研究的著作。

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幻想文学，以前多从科幻文学的角度来考察，认为这是科幻文学首次从西方进入中国。现在看来这个视角有些狭窄，无法反映清末和民国幻想文学中丰富的社会想象，事实上这些社会想象内容的比重大于作品中科幻的内容，甚至可以看作作品的主体。科幻视角对这种现象给予了简单化

^① 刘慈欣，山西阳泉人，科幻作家，代表作《三体》三部曲。2015年8月23日，《三体》第一部荣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为亚洲首次获得该奖项。

的理解，认为这是科幻的工具化，并认为中国科幻曾经发生的三种类型的工具化，即作为图解社会理想的工具、讽喻现实的工具和科学普及的工具，都源于这一时期。这种偏颇简单的视角无疑难以反映晚清和民国幻想文学中国家形象的深刻文化和政治内涵。

《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幻想小说。这个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对晚清和民国幻想文学研究的一个突破。这是一个比科幻视角更为准确的切入点，在社会幻想小说的框架中，20世纪初中国幻想文学的学术图景一下子变得完整和清晰起来。

本文所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国家形象”。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中，文学形象一般都是以人的个体形式出现的，而在科幻文学中，作为整体的一个种族、一个世界，甚至一个没有人或生命存在的环境，都可以作为独立的文学形象而存在，而在本文所定义的社会幻想小说中，国家则能够成为独立的文学形象，对国家形象的研究，是本文所建立的社会幻想文学评论体系对传统文学评论的一个重要扩展。

《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系统研究了晚清和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中的“中国形象”。文中首先回顾了这个课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在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情况下，这一领域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注意，同时用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语境和方法研究社会幻想小说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接下来，从社会幻想小说在中国古代的萌芽开始，本文论述了这一文学体裁在晚清的出现和发展，指出晚清知识分子心目中世界图像的改变，中国从世界中心位置的跌落以及西方进步文化的进入是中国社会幻想小说诞生的根源。本文准确地阐述了晚清社会幻想小说的特点：文学上简单化，注重群体而忽视个人，一方面幻想用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建立强大的中国，一方面意识深处却有着浓重的中国儒家文化情结。

《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的重点篇章是对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中“中国形象”的研究，正如本文开头一章所指出的那样，这也是以往近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最被忽视的一个领域，对这一领域的系统研究，可以说填补了一个空白。本文在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从多个不同的角度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中的“中国形象”。首先，文中展示了那一时期想象中的各种中国形象，包括未来中国、童话中国、鬼域中国和星际中国，接着更进一步探讨了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中的多重矛盾，包括“先进科技”与“落后政治”、

“童话初衷”与“成人意识”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幻想小说所反映的民国知识分子的多重立场和在希望与绝望间的纠结。这一部分的论述，是《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最深刻也最发人深思的部分。一方面，与晚清时相比，民国社会幻想小说在文学上更加成熟，其中的“中国形象”更加多样化，但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中国梦已经由晚清的美梦渐渐被噩梦所取代。本文所展示的在中国社会幻想小说中这一梦想破灭的过程确实令人唏嘘。

再往后的时间里，中国战乱接着战乱，曲折连着曲折，文学中连噩梦都消失了，只剩下严酷的现实，以后相当长的年代可以被称作“无梦时代”。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中没有涉及的一个时段，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从幻想文学的角度看，作为这一时期意识形态主体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理想是很有想象力的世界设定，按理说，即使出于宣传的需要，也应该会出现全景式描写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作品，但奇怪的是，中国的社会幻想小说在这一时期完全消失了，几乎找不到以未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郑文光的《共产主义畅想曲》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外）。中国文学何以会出现一个如此漫长的无梦时代，想象中的未来国家的文学形象何以在这一时期完全消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直到现在，世界进入了21世纪，动乱、灾难和曲折都渐渐远去，已被时光的尘土掩埋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梦又浮现出来，在这时，回顾和研究百年前这段一度被忽视的文学史的著作《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2015年6月6日

于阳泉

丨 序三：一个人的科幻十年 丨

吴 岩^①

任冬梅博士是我所佩服的一位年轻学者。从本科开始，她的研究目标就聚焦在科幻方向，从对单一文本的分析，到对文类的定名研究，再到对一个时段的发展描述，冬梅的工作秩序井然，方向始终没有变化过。在中国的科幻文学领域中，能坚持这么做下来的人并不很多。

但是，仅仅坚持着去做一件事情还不是最重要的，冬梅工作中所展现出的那些精巧设计，行文中所体现的那种节奏性张弛，观点中所表达的创新渴望，都是我所认识的科幻研究人才中不多见的。

回顾我跟冬梅的交往历史，要追溯到她来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的第一年。那一年，我的科幻课堂中多了一个来旁听的文静的女孩子。她平时言辞不多，但我谈到一些科幻界正在争论的问题时，她会比我自己的学生更早地发言，而且，从内容上立刻就能分辨出这是一个对整个行业非常熟悉的人。

后来我得知，冬梅从小就是科幻迷。少年时代她就狂热地阅读了大量科幻作品，看了数不清的科幻动漫和电影。这使她无论讨论什么，都充满了素材和初步的思索成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对凡尔纳的小说、对日本漫画《哆啦A梦》特别喜欢。

鉴于这种对科幻的热爱，当她走入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时候，就已经选定了科幻文学作为本科论文的主题。但是，到底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可能在她心中徘徊了很久。最终，她选定了研究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因为任何一种起源性的东西，都必然具备这个类别事物最根本的特征，而且表征极端明显。一旦你分析清楚了这个样本，对这个类型的了解必然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始。虽然我不认识她的本科导师，但我能看出，那个研究具有

① 吴岩，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幻作家，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科研的特色，对新东西的敏锐是她本科论文的重要特点。

接下来，冬梅的学业环境转移到北师大，她被保送成为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并师从现代文学研究方向的李怡教授。我记得有关硕士论文题目的选择，冬梅是跟李老师有过交锋的。但同样敏锐的李老师看到了这个领域中暗藏的学术机会，很快将冬梅的视野从仅仅关注科幻本身，拉到一个文类的高度重新设计选题。最终，她论文内容从研究具体的科幻发展转移到探索“科学小说”概念的生成。又一次从关键点做出的关键选择！但仍然聚焦于科幻这一文类的开始阶段。

有了好的题目，下一步是开始一个有序的工作。在这方面冬梅已经逐渐把华东师大跟北师大的优点进行了综合。她先是就中国人对科学观念的认知变化进行了全面梳理，然后再从全面考察晚清小说源流的发展历程上捕捉可能的文类起点。在我请她来我的课堂给同学们做报告的时候，我记得一个小故事。她说她曾经认为，所谓的“格致小说”也应该是科学小说，因为科学一词在中国曾被翻译成格致，但结果出乎她的意料。这种全面的探索，去伪存真地维护了科幻文类的边界稳定，比本科的论文选题难度更大。这一次，北师大的方法学开始在冬梅的身上发挥作用，文本的细读，对历史的追寻等更多地占据了文章的篇幅，但读起来并不觉得没有新意。我觉得无论在选题还是做法上，冬梅的这篇论文都值得被记住。

等我读到她的博士论文，已经是几个月之前了。这一次，她选择了晚清到民国接近半个世纪的较长时段，开始对一个时期类型发展的整体进行研究。这一次，她面对的任务是如何从更加驳杂的资料中选择对象。

博士研究总共只有三年时间，如何能够做好这个大题目，对冬梅是一个挑战。我很想知道她是怎么应对这个挑战的。直到取得论文，我才最终获得答案。她将一个时段的科幻问题，缩小到一个时段中某个主题（即中国形象）的研究。这使她能在时间管理上节约成本且不降低研究的深度。然而，在缩小的同时，她还做了一个扩充，将科幻小说的范围更改为更大的社会幻想小说，这使她能在更广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深化自己未来成果的学术价值。这种处理，再次体现出研究者对整个研究过程的把控能力。我觉得在高等学府求学的十年里，冬梅一步一步地成长轨迹，从这三篇论文的选题中看得一清二楚。

作为博士论文的修改版，本书的出版具有重要价值。全书的主题，是从晚清民国大量的小说中梳理出以社会幻想为主题的作品，再对这些作品中的中国

形象进行分析和特征提取，进而全面描述一个时代作品的大致风貌。作者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梳理，寻找那些具有相同或类似主题的作品，再一点点甄别和归类，工作的方法跟自然科学家所进行的探索非常类似。

当然，任何一种归纳都不是彻底的归纳，演绎也在这其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也恰恰是因为作者之前长期积累的知识技能和文学素养，使她能随时对看到的类型进行标定。全书从“未来中国”、“童话中国”、“鬼域中国”和“星际中国”四个方面，给这一时期社会幻想文学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划分出了形象和内容兼备的图画。有意思的是，四个类型其实不是内容而是某种边界的分类。“未来中国”突显的是小说中的时间边界，“童话中国”突显的是小说中的认知方式边界，“鬼域中国”突显的是小说中人生状态的边界，而“星际中国”则突显了小说中的空间边界。当我们把四个类型组合起来观察，则发现它恰好涵盖了时空人生的所有领域。在这样的分析之下，作者进而对四类作品在创作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矛盾进行了探查，发现“未来中国”关乎时代科技跟政治的交叉点，“童话中国”关乎国人心理成熟的交叉点，而“鬼域中国”和“星际中国”则关乎希望与绝望的交叉点。在这些交叉点上艰难前行的知识分子到底会有怎样的选择？多种不同立场的存在将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怎样丰富多彩的外观和内核？本著作即试图给这些问题找到答案。

我认为这本书有三个特点。

第一，著作对晚清、特别是民国时段的幻想小说进行的甄别和发现，给未来的科幻研究、想象力文学研究、社会发展和国家形象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对民国想象力文学的全貌有许多推测，但多年来这些文学到底存在在哪里、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存在了多大比重，都没有明确答案。作者的工作给这个领域的开发带去了一张初期草图。第二，著作建立在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继承和革新的基础上，一方面全面继承已有的中国小说的研究方法，重视史料的寻找和探查；另一方面则吸取国家形象等方面研究的当前成果，将已有的发现跟新理论和当前的学术热点相结合。众所周知，国家形象既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在过去二十到三十年间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当前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关注重点，对这样的主题仅仅做古典化处理或仅仅做当前新理论视域下的处理，都显得不足。唯有现在这种处理方式才具有积极意义。第三，这个研究在分类学方面跳出了一种标准统摄全文的简单化做法，尝试了从多个不同方式进行划界。也正是这种追求多元化分类的方式，才使作者能较好地描述相对复杂的现象。

当然，我觉得整个研究还属于承前启后的中期阶段。此前，王德威、杨联

芬等人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做过一些探索。现在的工作虽然把相关领域向前推进了一步，但离彻底打开这个区域的封闭，还差得很远。其次，我觉得案例考察量还不够。仅仅凭借一些典型案例推论整个时代的状况，可能还需要大量其他作品的旁证或补充。再次，研究的构思还显得有点传统，跟当前多样化的研究设计变革的局面还不完全相称。

但在这样的时期能完成这样大范围的工作，已经实属不易。这一工作不仅仅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而且对建立本土“中国形象认知”发展过程的更大范围的工作，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在北师大期间，冬梅一直旁听我的课程，参加我的读书小组，还协助我完成过许多科幻相关活动，她的讲演通常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毕业之后，冬梅虽然离开了她所喜爱的文学研究，从事起完全不同的工作，但她仍然跟科幻学术界保持紧密联系。当我邀请她在业余时间加入我主持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的研究工作时，她马上应允且从来都是按时完成研究计划，并提交高质量的研究报告。为此，我向她表示感谢。期待在未来的道路上，她还会一如既往地热爱科幻文学，把已经开创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2015年8月16日

| 目 录 |

总序：回到“大文学”本身 / 李怡 / 001

序二：中国梦的诞生、破灭和重现 / 刘慈欣 / 007

序三：一个人的科幻十年 / 吴岩 / 010

小引 / 001

绪论 梦想中国——社会幻想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 003

一、研究意义 / 003

二、概念辨析 / 010

三、研究现状 / 014

第一编 “社会幻想小说”在晚清的诞生

第一章 古代文学中的“社会幻想”萌芽 / 033

第二章 “社会幻想小说”在晚清出现 / 038

第三章 晚清社会幻想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 046

第四章 晚清社会幻想小说的特点 / 054